

旧唐书

(一)

後晉

劉昫等撰

舊唐書

卷一至一〇（紀）册

中華書局

舊唐書

(全十六册)

〔後晉〕劉昫等撰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人民路36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中華印刷廠印裝

*

250×1156毫米 1/32·175 1/8印張·3,089千字

1975年5月第1版 1975年5月上海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11018·656 定價：16.30元

出版說明

唐王朝（公元六一八——九〇七年）是中國封建社會從「盛世」開始轉向衰落的關鍵時期。由五代後晉時官修的《舊唐書》，是現存最早的系統記錄唐代歷史的一部史籍。本書原稱《唐書》，爲了區別於北宋歐陽修、宋祁等人編撰的《新唐書》，故稱《舊唐書》。全書分本紀、志、列傳三部分，共二百卷。

還在後唐時期，就對《舊唐書》的修撰做了不少準備工作，但直到後晉高祖天福六年（公元九四一年）才正式開始編修，到出帝開運二年（公元九四五五年）修成，歷時四年多。《舊唐書》原來是由宰相趙瑩監修的。他在組織人員、收集史料和確定體例上，提出了不少建議和規劃。以後的宰相桑維翰、劉昫也相繼擔任監修。而在具體編撰《舊唐書》時，出力最多的是張昭遠、賈緯等人。但當《舊唐書》修成時，恰好是劉昫監修唐史，由他奏上，所以題「劉昫撰」。

《舊唐書》的作者離唐代很近，有機會接觸到大量唐代史料，特別是唐代前期的史料。但是，《舊唐書》是在充滿着割據和混戰的環境中，在短期內匆促修成的，作者對史學又沒

有出色的見解和才能，因而對唐代史官的著述因襲多而加工少，缺乏必要的剪裁、整理和概括。例如，唐代史官爲當時的帝王將相迴護隱諱的敘述，《舊唐書》常常照抄不改。書中不少地方運用了「今上」、「我」等字眼，都是唐代史官的語氣。「今上」指唐史官撰述時的當代皇帝，「我」指唐朝。論贊中常出現「臣」字，也是唐史官對本朝的稱謂。《順宗本紀》、《憲宗本紀》、《劉仁軌傳》的評論，更直接引用了唐史官韓愈、蔣係、韋述的文字。可見《舊唐書》實際上反映了唐代以至後晉不少史家的看法。

唐代是我國歷史上比較強盛的封建王朝。這主要表現爲封建經濟空前繁榮，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國家進一步鞏固和壯大，國內各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關係更加密切，封建的文化和藝術有了新的發展。推動唐代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發展的力量是什麼呢？「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动力。」正是廣大農民革命的階級鬥爭，不斷衝擊着陳腐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掃蕩着那些阻礙歷史前進的反動統治集團，推動了封建社會從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的發展。隋末農民大起義摧毀了隋王朝的統治，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革命農民「得隋官及山東士子，皆殺之」〔二〕，沉重地打擊了魏晉以來反動統治的階級基礎士族豪門勢力，使他們「多失衣冠之緒」，「名雖著於州閭，身未免於貧賤」〔三〕，

從此一蹶不振。「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二〕在農民起義力量的打擊下，當時的世家豪族沒落了，一批中小地主在政治上乘機崛起。在這一基礎上，唐代初年的政治局面和統治集團的社會成分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中國封建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可是，《舊唐書》作者站在反動的階級立場上，竭力用歷史唯心主義觀點抹殺和顛倒唐代前期階級鬥爭的歷史。特別是，五代的許多統治者、包括後晉的創建人石敬瑭的父親，都是在鎮壓唐末農民起義中起家的。這種情況，對《舊唐書》作者的歷史觀發生了極其深刻的影响。他們對隋末農民起義採取了根本否定的態度，咒罵革命農民是「盜賊」，「小則鼠竊狗偷，大則鯨吞虎據」〔三〕，只有等到李淵、李世民這類「英雄」出來收拾局面，才出現了「羣凶席卷，寰海鏡清」〔三〕的太平「盛世」。這不但是對隋末農民大起義的污蔑，也是對歷史真相的歪曲。對於黃巢領導的農民大起義，《舊唐書》的作者還驚魂初定，記憶猶新，因而竭盡攻擊污蔑之能事。他們把《黃巢傳》置於全書末尾，把起義的領袖黃巢視爲「元凶首惡」，同安祿山、史思明、朱泚等叛亂的軍閥放在一起，傳文不長，而楊復光寫的吹捧鎮壓起义的効子手的文章《收復京師露布》却全文收錄，占全傳的四分之一，反映了《舊唐書》的作者對唐末農民起義及其領袖黃巢的刻骨的階級仇恨。

唐代始終貫穿着激烈的儒法鬥爭。這種地主階級內部不同集團革新與守舊、前進與倒退的鬥爭是當時整個階級鬥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受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這一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制約的。正是在隋末農民起義沉重打擊世家豪族的反動統治的基礎上，唐太宗、武則天等人物才有條件推行法家路線。但是，在後晉時，以石敬瑭爲首的反動統治者執行了一條守舊倒退的儒家路線。史學從來是爲政治服務的。《舊唐書》的作者從當時大地主階級的反動政治需要出發，把這條尊儒反法的路線貫徹到了史書的編修中去。他們「褒貶以言，孔道是模」^[二]，把孔學作爲評價歷史事件和人物的最高標準，從而顛倒了唐代的儒法鬥爭史。

「之栗思漢帝，碣石想秦皇。」^[三]唐太宗是一位具有法家精神的政治家。他從庶族地主利益出發，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主要是山東士族的豪門勢力，選拔庶族地主出身的人才參加政權；他採取了恢復和發展封建經濟、特別是農業生產的措施；他鞏固和發展了我國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國家。儘管唐太宗有時也搞一些尊儒活動，但他執行的基本上是法家路線。然而，《舊唐書》作者却竭力歪曲唐太宗的政治面目，抹殺他所推行的法家路線，而把他描繪成儒家的忠實信徒，企圖把唐初比較強盛的局面說成是用儒家這一套治

[一] 《舊唐書》卷一四九《于休烈等傳贊》

[二] 唐太宗：《春日望海》

理國家的成效。同樣，武則天是具有鮮明法家傾向的女皇帝。她進一步打擊了士族大地主，大量從庶族地主中選拔人才，不拘資格；她輕視儒學，促使「生徒不復以經學爲意」^(一)。這些措施，獲得了庶族地主的廣泛支持，對於唐代前期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和國勢的強大，顯然是有促進作用的。可是，《舊唐書》作者從封建正統觀點出發，百般詆毀，攻擊武則天稱帝是篡逆行爲，罵她是「姦人」^(二)，「毒侔蛇虺」^(三)。對反對武則天的舊貴族代表長孫無忌、褚遂良等人則大加贊美。他們還指責武則天統治時期「朝廷罕有正人，附麗無非險輩」；「朋比成風，廉恥都盡」^(四)。這純然是站在舊貴族大地主立場上對於武則天法家路線的污蔑。

唐朝中期以後，隨着掌握政權的大地主集團日趨腐朽，儒家路線日益取得了優勢，唐朝從「盛世」的頂峯上急劇地跌落了下來。但在唐順宗時，王叔文、柳宗元、劉禹錫等法家政治集團推行的革新措施，一度衝破了儒家路線統治下那種「沉沉夏夜閒堂開，飛蚊伺暗聲如雷」^(五)的局面，爲當時的社會政治帶來了一線生機。今天，我們還可以從柳宗元、劉禹錫的論文和詩歌中看到這個集團思想上鮮明的唯物主義傾向和進步的政治主張。然而，

^(一) 《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儒學傳序》

^(二) 《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紀論》

^(三) 《舊唐書》

^(四)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論》

^(五) 劉禹錫：《聚蚊謠》

《舊唐書》作者却拚命攻擊王叔文集團「乘時多僻」^[1]，是「由逕放利」^[2]之徒，污蔑柳宗元、劉禹錫在政治上「逐臭市利」^[3]，「蹈道不謹，昵比小人」^[4]。在《舊唐書》作者看來，武則天時期也好，唐順宗時期也好，都是「小人」當道，「正人」受到排斥。他們的所謂小人，是指地主階級革新派，所謂正人，是指地主階級保守派，把進步與反動完全弄顛倒了。這表明在地主階級內部儒法兩條路線鬥爭中，《舊唐書》作者是站在守舊派一邊反對革新派的。

在貫穿唐代整個歷史的儒法兩條路線鬥爭中，有一個重要的內容，這就是堅持郡縣制還是實行分封制的爭論。在這方面，《舊唐書》同樣表現出反對郡縣制、主張分封制的儒家保守觀點。

唐太宗貞觀年間，在要不要分封侯王和實行世襲刺史問題上，唐王朝內部曾經幾度展開爭論。士族大地主迷戀於南北朝時長期分裂的局面，他們的代表蕭瑀竭力主張分封，認為「前代國祚所以長久者，莫不封建諸侯」，誣蔑秦朝「罷侯置守，二世而亡」^[5]。經學家顏師古主張分封一部分王國，與州縣「雜錯而居」^[6]。李百藥、馬周、魏徵等則堅決反對分

[1] [3] 《舊唐書》卷一六〇《韓愈柳宗元等傳論》

[2] [4] 《舊唐書》卷一三五《盧杞王叔文等傳論》

[5] [6] 《舊唐書》卷四六《封建雜錄上》

封。李百藥寫了《封建論》，揭露分封制的弊害是「代增淫虐，時益驕侈」，「刑人力而將盡」，郡縣制的優點是「爵非代及，用賢之路斯廣」^[二]。馬周一針見血地指出，分封制將使「兆庶被其殃，國家受其敗」^[三]。魏徵結合當時形勢，提出了不能實行分封制的五項理由。他們的議論，代表了庶族地主要求加強中央集權、鞏固國家統一的進步主張。唐太宗最後採納了李百藥等人的意見，主張分封的守舊派失敗了，這是唐初法家路線的勝利。

唐代中期，隨着土地兼併的發展，統一的唐王朝受到了嚴重削弱，地區性的大地主集團勢力日益膨脹，藩鎮中堅持分裂割據的那部分勢力，一時甚囂塵上。在這種背景下，郡縣制和分封制的爭論再一次激烈起來。儒家代表劉秩在《政典》中首開其端，強調分封不但能使王朝長久，而且便於教化，發揚仁義，「仁義長則尊卑別，尊卑別則禍亂息」^[三]。這種儒家觀點，只能是爲那部分堅持分裂割據的藩鎮提供理論根據的。

柳宗元的《封建論》，在政治上是針對分裂割據的藩鎮勢力，在思想上是針對鼓吹分封的儒家思潮而寫的。《封建論》總結了秦漢以來分封制和郡縣制優劣得失的長期爭論，指出郡縣制代替分封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充分肯定了秦始皇統一中國、實行郡縣制的功績。柳宗元論證了郡縣制的優越性，「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歷史的規律是郡

[二] [三] 《唐會要》卷四六《封建雜錄上》

[三] 《唐會要》卷四七《封建雜錄下》

縣制必將最終戰勝分封制。這就有力地批駁了主張分封的種種謬論，打擊了復古倒退的儒家路線。柳宗元指出，威脅唐王朝統一的只是藩鎮中少數堅持分裂割據的軍閥勢力，因而主張「善制兵，謹擇守」，選拔擁護中央集權和國家統一的人擔任地方軍事行政官員。這種主張，反映了王叔文集團維護統一、反對分裂的進步要求。

在這一儒法兩條路線、兩種思想激烈鬥爭的問題上，《舊唐書》作者的立場顯然是保守的。他們認為：「子弟受封，周室竟貽於衰削；郡縣爲理，秦人不免於敗亡。蓋德業有淺深，制置無工拙。」〔二〕表面上批評分封制和郡縣制都不完善，都不能挽救王朝的衰亡，貌似折衷公允，實際上抹煞了兩種制度的優劣得失，而把封建國家興亡盛衰的原因歸結到帝王的「德業」上去，表現了儒家的傳統觀念，而同柳宗元的進步思想相對立。《舊唐書》的作者根本看不到唐代後期一部分藩鎮長期分裂割據的社會階級根源。唐中葉以後，大地主莊園經濟代替均田制而取得了統治地位。某些節度使本身在管轄地區內往往佔有大量土地，他們的高級幕僚也代表了本地區大莊園主的利益。同時，隨着府兵制的破壞，代之而起的是募兵制。藩鎮可以大量招募兵士作爲私人部屬。特別是以本地區大地主子弟爲骨幹的「牙兵」，實際上是少數藩鎮鬧獨立性的武裝支柱。但是，《舊唐書》作者認爲，「國家崇樹

藩屏，保界山河，得其人則區宇以寧，失其授則干戈勃起」〔一〕。把少數藩鎮的叛亂歸結為一個別人的問題，首先歸結為這些人「忠義之談，罔經耳目」，「斯乃王道寢微，教化不及」〔二〕。意思是說，某些藩鎮將帥不懂得以儒家的倫理道德來約束自己，是致亂之由。對於安祿山的叛亂，作者也認為是他「不能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三〕的緣故。應當說，這完全是尊孔崇儒思想的反映。

《舊唐書》作者對那些堅持分裂割據的藩鎮主張姑息因循，認為「勢亂不能卒治」〔四〕，只能採取寬柔撫慰的政策。唐德宗時，宣武軍行軍司馬陸長源「欲以峻法繩驕兵」〔五〕，結果為兵士所殺。作者批評陸長源持法太嚴，以致「禍不旋踵」〔六〕；同時贊美宣武軍節度使董晉「寬柔」，贊美敬宗時宣武軍節度使令狐楚「解其酷法，以仁惠為治」〔七〕。唐憲宗時，宰相武元衡積極主張討伐叛藩，被叛亂的藩鎮派刺客刺死，作者又責備武元衡「嫉惡太甚，遭懼不幸」〔八〕。《舊唐書》作者提倡儒家中庸之道，主張中央政權應該「以和為貴」〔九〕，對那些大鬧獨立性的藩鎮也採取「寬和」態度。

〔一〕〔三〕《舊唐書》卷一四三《李懷仙等傳論》

〔二〕《舊唐書》卷二〇〇下《安祿山等傳論》

〔四〕〔五〕〔六〕《舊唐書》卷一四五《劉玄佐陸長源等傳、論》

〔七〕《舊唐書》卷一七二《令狐楚傳》

〔八〕《舊唐書》卷一五八《武元衡等傳論》

〔九〕《舊唐書》卷一六五《韋夏卿等傳論》

總之，《舊唐書》作者反對郡縣制、贊成分封制的儒家觀點，說明他們在唐代中葉以後維護國家統一還是實行分裂割據的重大政治鬥爭中，是站在反動勢力一邊的。這是有它的階級根源和歷史根源的。五代的不少王朝是在藩鎮割據的基礎上建立的，實質上是放大的藩鎮割據。石敬瑭本人由藩鎮起家，《舊唐書》監修官趙瑩、桑維翰是石敬瑭的得力幕僚，同大地主集團和藩鎮割據勢力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特別是，石敬瑭及其一夥爲了建立自己的小朝廷，不惜出賣民族利益，甘當「兒皇帝」，乞得契丹貴族的援助，廣大勞動人民對他們恨之入骨。石敬瑭爲了苟安於一時，在對契丹貴族屈膝投降的同時，還必須取得大地主集團和堅持分裂割據的那部分藩鎮勢力的支持，因而對他們姑息容忍。史稱石敬瑭「取天下不順，常以此慚，藩鎮多務，過爲姑息」^[2]，正說明了五代特別是後晉統治者的歷史特點。石敬瑭認爲：「王者握圖立極，崇德報功，或開國以建邦，或苴茅而錫壤，乃樹藩屏，式獎忠勳。古先哲王，率由斯道」^[3]，公開承認某些藩鎮建立的小王國是合理的。《舊唐書》的觀點，充分地反映了五代時的政治風氣，特別是後晉王朝的立場。趙瑩關於《舊唐書》規劃的奏章中聲稱「褒貶或從於新意」^[4]。這個「新意」，實質上就是後晉反動統治集

[一]《新五代史》卷五一《安從進傳》

[二]《封錢元瓘吳越國王玉冊文》，《全唐文》卷一一七。

團的意志和政治需要。從這裏可以清楚地看到，任何一種歷史觀點，進步的或反動的，都是同一定的階級利益聯繫在一起的，都體現了一定的政治集團在具體階級鬥爭中的基本立場和路線。

《舊唐書》所根據的史料，唐代前期較多。重要的有吳兢、韋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繼纂述的《唐書》一百三十卷，對唐初至唐代宗時期的歷史事件敘述比較完整。還有唐高祖至唐文宗的各朝實錄。唐代後期的史料則掌握較少，只有《武宗實錄》一卷和其他零碎材料。《舊唐書》成書時間短促，大抵抄撮唐代史料成書，在材料的占有與剪裁、體例的完整、文字的乾淨等方面，後期大不如前。穆宗以後的本紀內容繁瑣冗雜；《曆志》、《經籍志》敘述僅至玄宗時代；列傳中對唐代末期人物缺漏較多；還存在着一人兩傳、一文複見等現象。這些都說明《舊唐書》比較粗糙。

但是，《舊唐書》敘述史實比較詳細，保存史料比較豐富，便於讀者瞭解歷史事件的過程和具體情況，因而受到後代的重視。如《順宗本紀》，對王叔文集團當政期間的政治改革措施記載比較具體。儘管作者對他們採取否定態度，但讀者從具體記載中仍然能够看出這一集團的進步作用。唐穆宗以後的本紀，雖然內容比較蕪雜，為後人所譏議，但也保存了不少富有價值的史料。如龐勛起義、黃巢起義，在《懿宗本紀》、《僖宗本紀》中都有比較

詳細的記載，由於列傳部分龐贊無傳、《黃巢傳》簡略，這些記載就更為可貴。昭宗、哀帝兩紀，對某些藩鎮、宦官的囂張跋扈，敘述頗為詳細，反映了唐王朝覆滅時的某些具體情景。宋司馬光著《資治通鑑》的《唐紀》部分，大抵採用《舊唐書》，就是因為它記事比較詳細明白的緣故。《舊唐書》還採錄了不少富有史料價值的文章。如《呂才傳》、《盧藏用傳》，分別登載了兩人反迷信的重要論文。《賈耽傳》登載了他進奏所編地理圖志的兩篇表。這些都是在中國思想史和地理學史上有地位的文獻。又如，在傅奕、狄仁傑、姚崇等人的傳中，登載了他們反對佛教的文章，從中可以考見唐代佛教盛行對政治、經濟、社會的重大影響，以及世俗地主反對佛教的鬥爭。這類文章其中有些是《舊唐書》最早保存下來的。繼《舊唐書》之後出現的《新唐書》，雖然在史料上作了許多補充，特別是志、表、唐代後期的列傳部分比較突出。但《新唐書》行文和記事往往過於簡略，使讀者不易瞭解具體情況。對《舊唐書》登載的大量文章，《新唐書》有的刪去，有的壓縮成簡短的片段，甚至因厭惡駢文，竟改寫成散文，改變歷史文獻的原來面貌。相形之下，《舊唐書》在保存史料方面就具有《新唐書》所不能替代的價值。

我們這次點校《舊唐書》，以清道光年間揚州岑氏懼盈齋刻本（簡稱懼盈齋本）為工作本，并參校了以下幾種主要版本：

一、南宋紹興年間越州刻本（簡稱殘宋本），全書已佚，殘存六十七卷，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舊唐書》即用此殘本與聞人詮本配補而成。

二、明嘉靖年間聞人詮刻本（簡稱聞本）。

三、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刻本（簡稱殿本）。

四、清同治年間浙江書局刻本（簡稱局本）。

五、清同治年間廣東陳氏蔚古堂刻本（簡稱廣本）。

點校中文字不主一本，擇善而從。凡是根據以上幾種版本改正文字的，一律不出校記。而根據《唐會要》、《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書校改的地方，都在每卷末尾作校勘記說明。關於前人校勘成果，除參考清人羅士琳等人的《舊唐書校勘記》（簡稱《校勘記》）外，還吸收了近人張森楷《舊唐書校勘記》、龔道耕《舊唐書補校》等幾種稿本的某些成果。

本書在標點、分段、校勘方面難免存在缺點和錯誤，希望讀者批評指出，以便改正。

舊唐書目錄

卷一 本紀第一

高祖 李淵

一

卷二 本紀第二

太宗 李世民 上

二

卷三 本紀第三

太宗下

三

卷四 本紀第四

高宗 李治 上

五

卷五 本紀第五

高宗下

八

卷六 本紀第六

則天皇后 武 翌

五

卷七 本紀第七

中宗 李顯

三五

睿宗 李旦

一五

卷八 本紀第八

玄宗 李隆基 上

一六

卷九 本紀第九

玄宗下

二〇

卷十 本紀第十

肅宗 李亨

二三

卷十一 本紀第十一

代宗 李豫

二六

卷十二 本紀第十二